

兗州佛教

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黄夏年／主编



科学出版社

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 论文集

黄夏年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黄夏年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03-032459-7

I. ①兖… II. ①黄… III. ①佛教史 - 兖州市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B94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8979 号

责任编辑: 张亚娜 王昌凤

责任校对: 郑金红

责任印制: 赵德静

封面设计: 美光制版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1/4 插页: 2

印数: 1—1 400 字数: 686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开幕式前排就座领导与嘉宾



研讨会现场

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开幕式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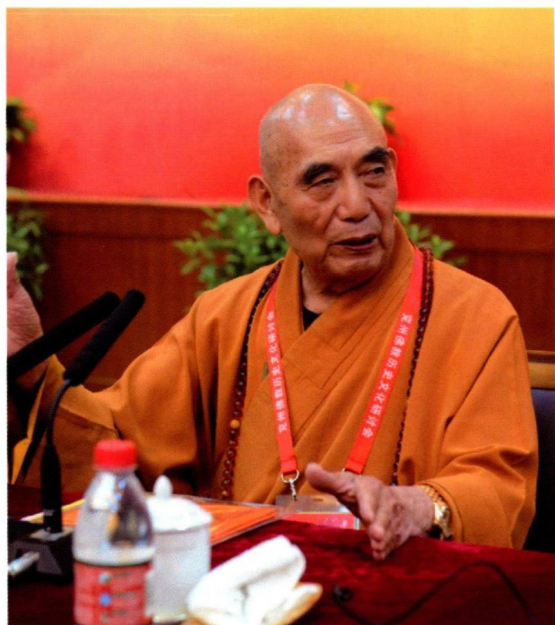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与会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



明哲长老（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湛山寺方丈）



大恩大和尚（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市大慈寺方丈）



温玉成（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前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夏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 录

从宋代佛舍利崇奉看兖州兴隆塔舍利的出土	杨曾文 (1)
兖州兴隆塔舍利在世界和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谭世宝 (15)
兖州兴隆塔佛舍利及其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法 缘 (52)
佛顶舍利渊源考	李利安 (78)
佛教舍利供养之内涵——兼论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佛顶骨舍利	王静磊 (84)
法藏使宋并其所献佛顶骨补说	段玉明 (94)
兖州佛牙与佛牙舍利	麻天祥 (102)
于阗僧人法藏与兖州宋代金棺	温玉成 (114)
兖州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与于阗佛教辨析	贾应逸 霍旭初 (122)
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佛舍利葬具雕刻图像分析与解读	刘建华 (128)
兖州佛教初传及兴隆寺始建考	何孝荣 (137)
北宋寺院制度文化及相关问题——基于兖州兴隆塔地宫新发现“龙兴寺碑”的 一项研究	王仲尧 (143)
兖州兴隆塔兴建及地宫供养佛舍利之寺院关系考	万 里 (159)
兖州兴隆塔地宫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安葬舍利”碑考释	谭世宝 (172)
跋《兖州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	严耀中 (196)
兖州高僧与隋朝舍利分布	徐文明 (200)
僧传所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兖州佛教一瞥	黄夏年 (205)
佛教史籍中的兖籍僧人及其宗派渊源略考	周建刚 (212)
浅识浅议兖州佛教历史资源之意义	周 齐 (220)
从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看兖州佛教之特点	洪修平 孙亦平 (227)
山东与成都大慈寺的佛缘	释大恩 (233)
兴隆寺圣物巡礼与大众佛教信仰	向世山 (239)
河南嵩岳寺佛舍利与阿育王塔	释永信 (245)
略论兖州兴隆塔在中国佛塔的演变与发展中的地位	谢路军 (249)
隋文帝开皇仁寿年间的佛教塔寺建设——兼论兖州兴隆塔之始建年代	周雁飞 (256)
从北朝经像到宋代塔宫——以兖州造像刻经与舍利塔藏为例	张 总 (276)
舍利子简介及对兖州出土文物的浅解	释弘恩 (282)
印度佛教的舍利崇拜与阿育王塔	印 顺 (286)
兖州佛教文化产业建设构想——以兴隆塔为中心	温金玉 (290)

兖州佛教文化资源可持续开发问题探讨	梁胜兴 (297)
旅游、朝圣与兖州佛教旅游开发简论	刘奉祯 (304)
兖州龙兴寺唐代《陀罗尼经》幢考略	陈靖华 (312)
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小考二则	李 翎 (323)
兖州出土《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补正	纪华传 (331)
关于兖州兴隆塔碑铭的若干问题	游 彪 (337)
阿育王塔在中国	道 坚 (342)
隋代以前的舍利塔	杨富学 王书庆 (345)
印顺大师的“舍利”观	吕有祥 (353)
南北朝的佛舍利信仰	圣 凯 (358)
舍利与佛教的普及	王公伟 (363)
兖州兴隆塔清代刻石录文及研究	胡孝忠 (370)
兖州兴隆塔舍利与汶上太子灵踪塔舍利的比较研究	谭世宝 (382)
唐宋兖州龙兴寺佛教探讨	王荣国 (390)
佛教朝圣与旅游经济	释清净 (411)
兖州兴隆寺、塔建置沿革及名称演变考	万 里 (417)
敦煌文献 P. 2977 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杨富学 王书庆 (439)

从宋代佛舍利崇奉看兖州兴隆塔舍利的出土

杨曾文

内容提要：从北宋佛教盛行的历史背景，考察兖州兴隆塔舍利、碑文和相关文物的出土，本文认为这些文物是北宋初期佛教信仰和舍利崇奉风行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应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给予客观评述；本文还对碑文中提到的于阗高僧法藏及兖州下达龙兴寺牒文的内容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兖州兴隆塔 龙兴寺 岱岳 舍利 法藏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山东省即墨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史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等。

2008年10月，兖州市文物局发布原秘藏于兴隆塔地宫的宋代崇奉佛牙舍利及相关文物出土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2009年4月笔者有幸蒙兖州民族宗教局同意参观了这些出土的佛牙舍利及相关文物，此后又拜读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谭世宝教授受兖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对这一发现所作的研究报告^①，受益良多。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媒体陆续报道中国不少地方在建设工程施工或修建寺院过程中发现佛舍利的消息，如北京、甘肃泾川、山西应县、陕西西安、陕西临潼、江苏南京、江苏苏州、广东广州、广东新州、辽宁朝阳等地皆有这种报道，而在山东继汶上县发布发现佛牙舍利的消息之后，毗邻汶上县的兖州又发布出土佛牙舍利的消息，而且二者皆是北宋时期供奉置于塔内的。

对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佛舍利及相关文物的发现应当如何看待，如何给予正确的评述呢？笔者认为，佛舍利崇奉既然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盛行的佛教信仰现象，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礼拜的重要内容，就应当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佛教信仰情况进行客观的考察和评述，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貌。

本文拟结合北宋前期的历史和佛教信仰情况，特别是佛舍利崇奉盛行的情况来对兖州兴隆塔佛牙舍利及相关文物的出土进行客观评述，提出自己的见解。

^① 谭世宝：《兖州兴隆塔地宫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安葬舍利”碑考释》，载山东省兖州市民族宗教局：《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佛教圣物参考资料》，兖州市民族宗教局印，2009年。





一、北宋前期社会和佛教传播概况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首先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振兴文教事业。

在宗教政策方面，继北周严加限制佛教乃至采取禁毁佛教的做法之后，宋朝前期几代皇帝不仅自己信奉佛教，而且大力支持佛教的恢复和发展。据宋朝著名学僧赞宁编撰的《大宋僧史略》记载，朝廷扶植佛教、道教，规定“每当朝集，僧先道后；并立殿廷，僧东道西，间杂副职；若遇效天，则道左僧右”，反映了宋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按照中国“尚左”的传统礼仪，左（东）位表示吉庆，右（西）位表示凶丧。宋朝虽然在总体上平等对待佛、道二教，但是实际上对佛教是采取稍为优待的政策，也许是因为佛教信众更多、影响更大的缘故。

在北宋前期皇帝中，宋太宗著有《妙觉集》，宋真宗著有《崇释论》、《御制释典法音集》、《御注四十二章经》、《御注遗教经》，宋仁宗著有《三宝赞》、《佛牙赞》，或赞颂佛教，或诠释佛法，或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对朝野儒者士大夫有很大的影响。

北宋朝廷重视翻译佛经，自唐元和六年（811）中断译经170多年之后，又恢复了国家译经事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译经院（后称传法院）翻译佛经，经真宗朝，至仁宗景祐四年（1037），前后译出大小乘佛典243部574卷，直到徽宗政和三年（1113）仍有少量佛典译出。同时，除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等经录刊印大藏经外，还陆续将新译佛经及天台宗、律宗和法相宗的著作入藏刊行。

北宋所译佛经虽然影响不大，但是朝廷重视译经的态度和任命高官主管译经的做法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译经从开始任命三四品官员到从二品的官员担任润文官，如汤悦、张洎、杨砺、朱昂、梁周翰、赵安仁、晁迥、杨亿、李维、王曙、宋绶、高若讷以及冯京等皆先后担任过润文官。宋真宗晚年为提高译经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进而任命身居“宰辅”高位的官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官”，代表皇帝主管译经事业，先后有丁谓、王钦若、吕夷简、章得象、陈执中、庞籍、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宰辅重臣担任过这种职位。其中，晁迥、杨亿、李维、王曙、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此重视译经，自然增强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的影响。

北宋大体上延续了隋唐佛教的管理制度，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管辖下设立僧官管理全国佛教和僧尼的事务。在汴京设有左右街僧正、僧录、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等僧职；地方州府设有僧正、都僧正等职。^①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中华书局，1957年。





宋代支持佛教传播发展，同时也有政策加以限制。僧尼正式剃度受戒必须持有祠部下发的度牒、空白戒牒，否则只能作为“童行”（注册于寺院户籍，称“系帐童行”）或“长发沙弥”，等待朝廷下发州府度牒后，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剃度为僧尼。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僧 397 615 人，尼 61 239 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 2.3%^①。

二、北宋前期佛舍利崇奉盛况

佛舍利供奉，是佛教信仰和礼佛供佛礼仪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佛教经论和其他佛教文献中对佛舍利、佛牙等的记述差异很大。

从佛教历史考察，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后期已经出现佛舍利崇奉的现象。据《长阿含经·游行经》的记述，在释迦牟尼佛圆寂火化以后，有八国信众将分得的佛舍利建塔恭敬供养。此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随着佛教向亚洲各国的传播，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自进入南北朝特别是进入隋唐以后，流行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体，运用大乘佛身思想来解释舍利，将释迦牟尼佛、佛经中所说无数诸佛与佛舍利皆看做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法身（或称真身）佛的显现。按照唐代著名律僧道世所编撰《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的说法，“舍利”译自梵文，意为“骨身”（或称为灵骨），有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赤色的肉舍利，然而皆是佛法身的显现，所谓“囊括今古，圣变无穷，祥应荐臻，瑞光频朗”^②。宋代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四《分舍利》也说：“如来久远劫来数数出现，盖将开生身（按：指化身佛）之迹，以显法身之本；即碎身（按：舍利）之狭，以见全身之遍。”卷四十五说：“所谓佛牙舍利者，此盖真身应物示化之一法也。”宋仁宗撰《舍利赞》说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孔圣、老君，皆“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唯有吾师（按：释迦牟尼佛）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③。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佛教信仰情况和信徒对舍利的看法。

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从南北朝以后逐渐兴起，经隋唐二朝，至北宋仍十分兴盛。隋文帝即位前，一位印度僧人赠他一包（一裹）佛舍利，请他供奉。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从仁寿元年（601）到仁寿四年（604）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 111 个州送去舍利建塔安奉供养，以表示亲率全国臣民兴隆佛法，祈祷佛保佑国泰民安，并命各地上报在此期间出现的祥瑞感应，最后汇总由著作郎王邵写出《舍利感应记》、安德王杨雄写出《庆舍利感应表》，无论对当时社会还是对佛教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中华书局，1957 年。《文献通考》卷十一载，天圣七年（1029）全国主客户人口为 26 054 238 人。

^② 见《大正藏》卷 53，第 598 页下。

^③ 见《大正藏》卷 49，第 167 页中、第 409 页中。





唐王朝的舍利崇奉集中表现在对凤翔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迎奉供养上，在 200 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次迎请佛指舍利入宫供养，以求“岁丰人和，天下太平”。应当指出，隋唐时期这种佛舍利崇拜和供养的现象，与当时的译经、寺塔兴建、佛事繁盛、佛教宗派创立等现象一样，是当时佛教盛行的一种表现。

承此余绪，进入宋代以后，佛舍利崇奉仍十分兴盛，然而其突出特色是与宋代的译经和伴随译经而频繁进行的中印佛教交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北宋太祖在平定陕甘诸地之后，通往印度西域的道路已通。乾德四年（966），宋太祖下诏说：“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当时行勤等 157 人应诏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朝廷皆赐予他们诏书、谕令，并派人做向导，各赐装钱（盘缠）三万。他们经今河西走廊，沿着丝绸之路走过新疆境内焉耆、龟兹、于阗，然后进入布路沙（在今巴勒斯坦国白沙瓦的西北）、加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最后进入印度。^① 这些僧众以及以后陆续上路的求法僧，在回来时皆带回梵文佛经，有的还带回舍利及佛像、宝物。

现据《宋史》、《景祐新修法宝录》、《佛祖统纪》^② 相关记载，将北宋太祖至仁宗前期从印度、西域进献佛舍利的情况制成表 1，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崇奉佛舍利的概况。

表 1 北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进献佛舍利情况

庙号	年号 纪年	公元 纪年	进献人	进献舍利名称	其他主要物品	出处
太祖	建隆三年	962	高昌国遣僧法渊	辟支佛牙	玉器	《佛祖统纪》卷四十三
	乾德三年	965	沧州沙门道圆游五天竺往返十八年，偕于阗使者还	佛舍利	贝叶梵经四十夹	同上、《宋史》卷四百九十
			甘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	佛牙	琉璃器、琥珀盏	《宋史》卷二及卷四百九十
	开宝五年	972	西天竺沙门苏葛陀	舍利	文殊华	《佛祖统纪》卷四十三
太宗	太平兴国三年	978	开宝寺继从等自西天竺还	佛舍利塔	梵经、菩提树叶、孔雀尾拂	同上
			中天竺沙门钵纳摩	佛舍利塔	犍牛尾拂	同上
	太平兴国七年	982	成都沙门光远游西天还	佛顶印	西天竺王子没徒囊表、贝多叶、菩提树叶	同上
	太平兴国八年	983	沙门法遇自西天来	佛顶舍利	贝叶梵经	同上

① 见《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传六》、《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大正藏》卷 49，第 395 页中。

② 分别载《中华大藏经》第 73 册、《大正藏》第 49 册。





续表

庙号	年号 纪年	公元 纪年	进献人	进献舍利名称	其他主要物品	出处
太宗	端拱二年	989	太原沙门重达自西天还,往返十年	佛舍利	贝叶梵经	同上
			中天竺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	佛舍利	梵经	同上
	至道元年	995	中天竺沙门迦罗扇帝	佛顶舍利	贝叶梵经	同上
真宗	咸平元年	998	中天竺沙门你尾拏等	佛舍利	梵经、菩提树叶、菩提子数珠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景德元年	1004	西天三藏法护	佛舍利	贝叶梵经	同上
	大中祥符二年	1009	西天沙门众德	舍利	梵经、菩提印	同上
			中天竺沙门觉称、法戒	舍利	梵夹	同上
	大中祥符六年	1013	天竺沙门宝贤	佛骨	梵经十九夹、菩提树叶、无忧树叶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
			西天竺沙门知贤、胜贤、东京沙门德超、恽澄	佛骨舍利	梵经四夹、铁钵、玉璞	同上
	大中祥符七年	1014	天竺沙门演贤、东京沙门惠琛等十六人,自西域至	佛骨舍利	梵经十四夹、金刚座印、念珠	同上
			沙门怀庆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三夹、菩提树叶、无忧树枝	同上
	大中祥符八年	1015	沙门怀戈等四人从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十三夹、菩提念珠	同上
			沙门洪善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二夹、无忧树叶	同上
			天竺沙门勇密	佛骨舍利	梵经六夹、铜佛像、中印度波罗奈国佛转法轮处印记	同上
			西天竺沙门无畏、中天竺沙门觉吉祥	佛骨舍利	金刚座印	同上
			天竺沙门天觉、妙德、僧护	佛骨舍利	梵经十二夹	同上
			沙门继全自西天还	佛舍利 (建塔扬州)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续表

庙号	年号 纪年	公元 纪年	进献人	进献舍利名称	其他主要物品	出处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	1016	天竺沙门童寿、智友	佛骨	梵经一夹、镂牙观音菩萨像，以天竺园菴摩罗木为龕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
			沙门绍敏、绍暹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二夹、菩萨像、菩提念珠	同上
			北天竺优填曩国沙门天觉、南天竺师子国沙门妙德、西天竺迦蹉国沙门等	舍利	梵经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天禧元年	1017	沙门泰永自天竺还	佛骨	梵经十二夹、金刚座印、无忧树叶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
			沙门本净、怀问自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二夹、念珠	同上
			沙门遵泰、德圆自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十夹、菩提念珠	同上
	天禧二年	1018	沙门义仙等四人自天竺还	佛骨	梵经二夹、无忧树叶	同上
			沙门清雅、守元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二夹、念珠、菩提树叶	同上
			沙门真泰自天竺还		梵经五夹	同上
	天禧三年	1019	沙门德钦等六人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十四夹、念珠	同上
	乾兴元年	1022	龟兹国僧华严	佛骨舍利	梵经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仁宗	乾兴元年八月	1022	天竺沙门能寂	佛骨舍利	梵经三夹、画像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七
	天圣元年	1023	梵学沙门文涉、东京沙门怀问、行美等六人自天竺还	佛骨舍利	梵经二十五夹、念珠、菩提树叶	同上
	天圣二年	1024	天竺沙门信护、智贤、爱贤	佛舍利	梵经三十夹、金刚座印、画塔像	同上
			沙门义请自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十夹、菩提念珠	同上
	天圣四年	1026	沙门惠则、可蕴自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十三夹、无忧树叶	同上
			沙门志喻、志津等四人自天竺还	佛顶骨	梵经十夹	同上



续表

庙号	年号 纪年	公元 纪年	进献人	进献舍利名称	其他主要物品	出处
仁宗	天圣六年	1028	沙门智升、绍频自天竺还	佛舍利	梵经十一夹、菩提念珠	同上
			天竺沙门调伏军、觉贤、天贤	佛舍利	梵经十夹	同上
	天圣八年	1030	天竺摩伽陀国沙门不动护与弟子释吉祥、明护	佛顶骨	梵经十四夹、雕镂佛像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八
	宝元二年	1039	三往西天僧怀问、沙门得济、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揭陀国还	佛骨舍利	贝叶梵经、贝多子、菩提树叶、无忧树叶、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	《佛祖统纪》卷四十五

根据表 1，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 自北宋太祖乾隆三年（965），经太宗、真宗二朝，至仁宗宝元二年（1039）为止的 74 年间，共有 45 批印度及西域僧人或使者、中国赴印求法回归者带回佛舍利，而且绝大多数人还带回梵文佛经及佛像或其他宝物。按照惯例，他们必须将舍利、梵文佛经及宝物进献朝廷，然后得到朝廷赐给的紫衣（紫袈裟）、束帛、金币，其中极少人还会有幸得到大师的赐号。

(2) 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进献朝廷的舍利名称非一，有的只称舍利，有的称佛牙、骨舍利，还有宋真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至道元年（995）、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天圣八年（1030）四次进献的佛顶骨舍利，进献次数之频繁、数量之多，可以说为历朝所罕见。这些名称非一的舍利乃至佛遗迹处的物品（如释迦牟尼佛诞生处的无忧树叶、成道处的金刚台座模像 [印]、菩提树叶等）承载着僧俗信众尊崇的佛的神圣象征，皆属于当时佛教信仰的领域。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之所以不远万里从印度或西域将舍利带来进献北宋朝廷，是迎合了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朝廷、朝野佛教界僧俗信众的崇拜和供奉佛舍利的需要，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

(3) 北宋朝廷对这些进献的舍利是如何处理的呢？这方面记载很少。从上面略表可以看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沙门继全从天竺回来进献舍利，朝廷在扬州建塔安奉供养。另外，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宋真宗得到泗州奏文，报告说泗州供奉唐代僧伽和尚（被看做观音菩萨化身）的塔在白昼放光，每天百姓前来礼拜者达千人之多，有的甚至燃顶烧臂供养。他立即敕内侍奉“释迦舍利”奉藏于泗州塔下。看来内侍送往泗州的“释迦舍利”就是印度或西域僧、中国求法僧进献的舍利。

关于北宋朝廷崇敬、供奉舍利的情况，现存史书文献中也有若干记述。传说唐代长安西明寺道宣曾感得北方毘沙门天王长子那咤太子送他佛牙（传说原出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至其弟子文纲时安葬于长安崇圣寺塔下，唐宣宗时在崇圣寺另建塔安奉，唐末昭宗被朱温胁迫迁都洛阳时将此佛牙安奉于天宫寺。宋太





祖继北周灭佛之后特别尊奉佛教，重视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他听说佛牙的故事后，先是表示怀疑，派人到洛阳将佛牙送到汴京，并放到火中烧以辨真假，看到佛牙未变色，便断定是真，为之礼敬并作愿文。宋太宗时曾再次以火验证，然后撰偈赞颂，并将佛牙安奉在大相国寺法华院。宋真宗将佛牙改奉于开宝寺灵感塔地宫，亲往瞻拜，作偈赞颂。宋仁宗时，两次将佛牙迎入内殿供奉，作发愿文和偈赞，称颂佛牙永世常在，谓“唯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宋英宗时，敕大相国寺造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制佛牙赞碑》，命儒臣王珪撰文记其事^①。

当然，并非朝廷所有官员皆热衷崇奉舍利，也有的高层官员站在儒家的立场提出异议。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安奉佛牙的开宝寺灵感塔发生火灾遭毁，宫人多有灼臂落发表示崇敬归命者。宋仁宗命中使取塔地宫所藏佛牙塔入内宫供养，并且计划重新建塔安奉。但先后遭到大臣蔡襄、余靖的反对。

蔡襄（1012～1067），福建仙游人，字君谟，天圣进士，当时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不顾安危向仁宗直谏说：“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

余靖（1000～1064），韶州曲江人，字安道，天圣进士，当时任右正言，支持参知政事范仲淹实施“庆历新政”。他上奏对宋仁宗再修开宝寺灵感塔的计划提出反对意见，说：“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劳罪己，忧人之忧，则四民安居，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广事浮费，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经火不坏，遽为神异，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灵凭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卫，为火所毁，况藉其福以庇民哉？”^②

他们二人奏议的主要内容是劝仁宗将勤政、爱民和务实节用置于首位，劝谏他不要“专信佛法”，“广事浮费，奉佛求福”，崇信舍利神异威灵而废弃朝政大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宋仁宗继续崇奉佛教的态度和供奉舍利的做法。

总之，北宋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尊奉佛教，重视和支持佛经翻译、推动中印佛教交流、尊崇和供奉舍利、大力扶植佛教传播和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当时出现了兖州、汶上和其他各地建塔供奉舍利的事情。

三、关于兖州兴隆塔出土舍利的若干考察

兖州兴隆塔地宫舍利及相关文物、北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③安葬舍利碑（下称兴隆

^① 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卷五十三，载《大正藏》第409页中、第460页下，并参考《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所载王珪《华阳集》卷四十六收录的《左街大相国寺释迦佛灵牙序》。

^② 见《宋史》卷三百二十《蔡襄、余靖传》。

^③ 谭世宝文章引文用括号注明嘉祐八年癸卯岁十月六日是阳历（1063.10.9），有误。年正确，月日有误，应是1063年10月29日。

